

書叢治政代現

治政聯蘇現

董工司

五雲
由
壳

97

行謨館書印務商

章王林
雲孟工
慤五編著
主編

現代政
治叢書
現 代 蘇 聯 政 治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月初版

(31241. 3)

現代政
治叢書 現代蘇聯政治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捌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著者

林和平孟六號
王雲五河南路

主編者
韋王

發行人
印刷所

上海西愛威斯路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本書校對者沈鴻俊)

編者序言

蘇聯在今日已算一個大體具備有社會主義形態的國家。但牠顯然還不會完全實現社會主義的理想，換言之，就是牠還在向着社會主義理想推移轉化的過程中。我們要解述這種國家的政治動態，如用一句話概括，只說是牠在『向着社會主義之道邁進』也行；至多，列舉幾個屬於社會主義的理想政治概念（如自由平等之類），說是牠在努力實現那幾個概念，亦就够了。

不過，問題不能這樣簡單的解決。我們甚且還可指出一些關於蘇聯政治動態，須得從長討論的理由；第一，社會主義的理想，是由世界革命而實現世界大同的場面。蘇聯還只是世界的一部分，由資本主義勢力支配的其餘大部分的世界，對於蘇聯是採取對立的包圍的態。在此種局面下，蘇聯就不但不能順利的照着理想的計劃做去，甚且還要在所謂『一國社會主義』建設程序上，一方面與勢不兩立的資本主義國家圖謀妥協，實現和平外交；另一方面，更還要用全力去從事真

正社會主義社會所不需要的軍事國防的工作。單就這種事實而論，蘇聯的政治動態，已因其頗大的伸縮彈性，而饒有研究的餘地了。況且第二，蘇聯從上述這方面說，儘管在採行『一國社會主義』的非常政策，但在其一國境界以內，其所有的舉措，究還能依照社會主義的程序做去。我們知道，社會主義的活動，是中央集權的，是計劃的，是統合的；社會各方面的設施與活動，誠然都在儘可能的保持分工原則，但這每一個方面，每一個部門，與其他一切方面一切部門通是在一個中心計劃之下行動。而政治活動又是那種中心計劃的發動體。因此，我們談蘇聯政治，不能把牠與一般帶有工具性質與裝潢性質的資本主義政治混為一談。牠的每種政治步驟，都會在其國內經濟、軍事、外交、文化……等等方面發生決定的影響。第三，蘇聯的孤立繁榮，誠然能對資本主義世界發生威脅的作用，但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政治危機愈益加深擴大，同時也會正比例的增大其對於蘇聯施行『懲治』與『征服』的要求；這要求反過來反映到蘇聯的內政外交上，難免不引起一些政治的黨爭的波瀾，而使其全般政治動態，發生某種限度的改變。

總之，蘇聯是一個特殊的國度；對於牠的政治動向的把握，非從其中央集權的強力政治統制

下的一切方面的實際活動情況，不能得到具體的說明。本書所以就國家機構，就計劃經濟，就民族問題，民生問題，就軍事國防，就外交政策，就黨爭，就新憲法各方面來分別解述，乃是希望由此予讀者以更確切更顯明的認識。至若書中有脫漏乖誤的地方，則甚願不吝指教。

目 錄

第一章 緒論	一
第一節 革命前的俄國政治	一
第二節 革命後的一般政治情勢	一二
第三節 蘇聯政治的一般動態及其看法	二〇
第二章 從國家機構所見的政治動態	二五
第一節 俄羅斯，蘇俄，蘇聯	二五
第二節 蘇聯政治體制及其特質	二八

第三章 從計劃經濟所見的政治動態	四六
第一節 蘇聯經濟的三度轉換	四六
第二節 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	五三
第三節 新舊五年計劃的任務與成果	六二
第四節 隨計劃經濟演進而展開的政治動態	七五
第四章 從民族民生問題所見的政治動態	七九
第一節 蘇聯民族民生問題的特質	七九
第二節 解決民族問題的途徑	八四
第三節 解決民生問題的途徑	九一

第四節 由平等的結合到平等的享受 九七

第五章 從外交政策所見的政治動態 一〇五

第一節 被封鎖中的奮鬥 一〇五

第二節 對歐洲的外交政策 一一〇

第三節 對東方的外交政策 一二〇

第四節 對美國的外交政策 一二四

第五節 在對外政策上反映出的政治動態 一二九

第六章 從軍事與國防所見的政治動態 一三五

第一節 赤軍的組織 一三五

第二節 軍事教育的普遍 一四一

第三節 海陸空軍的實力	一四五
第四節 東西境的國防	一五〇
第五節 政治上的國防總動員	一五七
第七章 從黨爭上所見的政治動向	一六二
第一節 蘇聯黨爭概述	一六二
第二節 正統派與反對派所爭論的主要問題	一七〇
第三節 正統派勝利以後的政治設施	一七九
第八章 從憲法改革所見的政治動態	一八四
第一節 蘇聯憲法的特徵	一八四
第二節 新舊憲法的比較	一九四

第三節 新憲法與民主主義

一九八

第九章 結論——蘇聯的將來 一一〇五

第一節 從國內情況看到的將來 一一〇五

第二節 從國際關係上看到的將來 一一一

參考書 一一九

現代蘇聯政治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革命前的俄國政治

蘇聯是俄國在革命後的新名稱。在政治上，蘇聯對於俄國，乃是表示一個轉新的轉變與新的標幟。但俄國的歷史，卻並不因此就從中切斷。我們論述現階段的蘇聯政治動態，誠可不問及牠的過去；但如把革命前的俄國政治作一概括的回顧，那於我們在後面解述蘇聯政治動態時，有不少的方便。

由十九世紀初期到二十世紀初期的將近一百年中，俄國的一般經濟狀態一直都是比較落

後的。在那種落後經濟狀態下所表現的專恣而腐敗的政治，恰好是育成一九一七年大革命的溫牀。不過一九一七年大革命雖是對於過去俄國黑暗腐敗政治的總決算，但在這次總決算以前，俄國人民並非完全俯首貼耳的順受橫暴封建勢力的統治，他們在不斷的反抗，不斷的為此後大革命撒播革命的種子，增積革命的戰鬪的經驗。為了敘述上的便利，我們甚且可以把他們反抗專制封建勢力的幾個轉化階段，作為理解革命前俄國政治的路標。那路標大體可區劃為以次三個時代：

(一)十二月黨時代。

(二)人民黨時代。

(三)社會民主黨時代。

上面第一個時代即十二月黨時代所代表的，是十九世紀初期的俄國政治。人民黨時代所代表的是十九世紀中葉前後的俄國政治，而社會民主黨時代所代表的，則是十九世紀末乃至二十世紀最初的俄國政治。現在且分別述其梗概。

所謂十二月黨(Dekalristi)是指着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對專制政治發動革命叛亂的一羣黨人，因為暴動發生於十二月，故有十二月黨之稱。十二月黨叛亂所由發生的俄國政治經濟背景，大體是下面這樣：在十八世紀末乃至十九世紀初年俄國尚是一純粹東方的專制國家；無上專制的俄皇乃至他的貴族階層，完全是依着最殘酷的封建剝削，而度其奢華腐敗生活；在他們壓制下的廣大農民階層，連同他們苦苦耕作的土地，都是貴族地主們的私有物；貴族地主得任意把他們連同土地處理。他們因不堪壓迫，在十八世紀下半期雖發生過若干次暴動，但當時因為統治階層採行愚民政策，竭力禁止當時流行西歐的民主思想輸入，以致這些農奴暴動，都以缺少覺醒的知識份子的鼓吹與領導，而沒有演出何等有聲有色的成績。自一八一二年西歐的民主思想與立憲政制，隨拿破崙(Napoleon)的大軍衝入莫斯科以後，俄國一部分軍人以及一般有覺悟的知識份子，乃在拿破崙敗退後不久，醞釀着改革政制，改革農民經濟生活的革新運動。這個運動的中心表現，就是此後一八二五年十二月的十二月黨的叛亂。十二月黨發難係在彼得格勒，但其「最顯明的政綱和最堅決的運動，不在彼得格勒，而在離彼得格勒甚遠，即今之奇也夫斯基省、窩林斯基省、波

多爾斯基省的領土內，那是當時俄國軍隊主要力量集中之地，是極左的十二月黨組織的所在地。與十二月黨相關聯的所謂「斯拉夫大統一社」是由窮苦人們和下級軍官（特別是砲兵軍官中的知識份子）組織而成的……他們是合法的大斯拉夫主義的先覺者……以統一所有斯拉夫種族為一個聯邦共和國而建設偉大的自由的斯拉夫國家為職志……他們說他們是德謨克拉西主義者。」十二月黨與其派生的許多組織，雖然沒形成何等具體的黨綱，並且其參加人物中，還包含有若干開明的地主，以致今日尙論十二月黨的歷史意義的人，還說他們是純為擁護地主利益欺瞞士兵。其實十二月黨中的特出人物比斯特爾（Bistel）已主張在革命當中或革命之後，把所有國家的土地合併為一個公共的基金，嗣後將這基金，等分為二，一半分配居民，但不能作為私產，只可使用。另外一半歸國家處理，國家可將這土地大批出租，甚至可以出賣於私人。這主張在今日看來雖有許多漏洞，但在全俄國農民分領土地不及三分之一的當時，卻已經是非常有利於農民的激烈步驟了。不過，這個黨實際進行了的工作，只是運動彼得格勒等地的軍隊叛變，至若他們的主張和其斷片的綱領，在叛變很快的被鎮壓下去了的當中，自然沒有見諸實行的機會，但雖

然如此，他們實現立憲政制與取消農奴制的企圖，卻是灼然可見的。本來在一八二五年十二月黨叛變以前，還有許多祕密社團組織：一八一四年有『俄國騎士團』，一八一七年有『救亡同盟會』，一八一八年有『幸福同盟會』。所有這些組織，都是由於一八一二年拿破崙的轟擊莫斯科的大敗，驚醒了禁錮已久的俄國人的政治意識。

十二月黨失敗以後，俄國又進入一個新的反動時期。尼古拉斯第一 (Nicholas I) 鑑於十二月黨的叛亂，乃絕對排斥歐洲新思想的流入，禁止人民游歷外國，限制莫斯科大學的學生爲三百人；密張文網，亂捕主張自由思想的知識份子。終尼古拉斯第一之世（一八二五年——一八五五年），俄國的政治反動，實較前一時代尤甚。亞歷山大第二 (Alexander II) 在一八五四—五年的克里米亞戰爭挫敗之餘，續承皇位，爲安定人心，雖不能不採行新政，於一八六一年下詔解放農奴，但放奴以後，農民疾苦，並未見減少。因爲當時解放的土地，只以一半分給農民，此外則仍爲教會、皇室和私人地主所有。由是農民所分得的土地，極其有限，耕地既小，又無改良土地的資本，同時並還要負擔政府爲分年償還地主代價而課加於他們的租金。結局農民的困苦狀況，反變本加厲。至亞歷山

大推行的其他許多新政，如設立地方自治，施行司法獨立等等，不但都是敷衍了事，且還是交給一般貴族官僚們去包辦。所以在一八六六年，就有加拉古作夫（Karakozov）謀刺亞歷山大的事件發生。當加拉古作夫被捕至俄皇之前，俄皇問他：『你為什麼要刺我？』加拉古作夫的回答是：『因為你允許了農民的土地與自由而又欺騙他。』——這是一針見血的明確定案，但亞歷山大經過這次虛驚後，更採行極端的反動政策，由是反抗高壓的革命黨人都提出『到民間去』（Vnarod）的口號，而所謂人民黨（Narodniki），就是主張實行這個口號的革命團體。在一八七四年頃由國外留學回來的學生，以及國內的大學生中學生，都分別到農村去作宣傳運動。有名的女革命家庇洛夫斯喀雅（Perovskaya）及無政府黨領袖克魯泡特金（Kropotkin）都曾為此種運動的參加者。事實上，巴枯甯（Bukmin）在一八六九年的革命策劃，已經主張首都及省城的宣傳員，轉到民間去，開始在貧窮的民衆中宣傳。這個『到民間去』的革命運動，雖然在不久的期間，即慘遭敗北，但『人民黨』的黨人，後來又組織名為『土地與自由』（Zemyla i Velya）的祕密團體，更由此團體產生一名為『人民的自由』（Varodnaya Velya）的恐怖組織，專以刺殺俄皇為事。然而